

宋代文學研究叢刊

卷十二

程千帆題 



麗文文化事業

宋代文學研究叢刊

卷十二

程千帆題



麗文文化事業

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十二期

顧問 (依姓名筆畫為序)
王水照 (復旦大學)
朱靖華 (人民大學)
張 健 (臺灣大學)
傅璇琮 (清華大學)
黃啟方 (世新大學)
曾棗莊 (四川大學)
楊松年 (新加坡大學)
楊海明 (蘇州大學)
龔鵬程 (佛光大學)

主 編 張高評 (成功大學)

副主編 王偉勇 (成功大學)

編輯委員 (依姓氏筆畫為序)
王次澄 (英國倫敦大學)
王兆鵬 (武漢大學)
王偉勇 (成功大學)
內山精也 (日本早稻田大學)
衣若芬 (中央研究院)
朴永煥 (韓國東國大學校)
何寄澎 (臺灣大學)
沈松勤 (浙江大學)
周裕鍔 (四川大學)
孫克強 (河南大學)
張 毅 (南開大學)
黃文吉 (彰化師範大學)
莫礪鋒 (南京大學)
陶文鵬 (中國社會科學院)
費君清 (紹興文理學院)
陳友冰 (安徽社會科學院)
韓經太 (北京語言文化大學)
詹杭倫 (人民大學)
盧慶濱 (英國倫敦大學)
鍾振振 (南京師範大學)
薩進德 (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)

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(第十二期)

目次

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(下)·····	張高評···	1
蘇賦十題·····	曾棗莊···	47
宋詩與類書之關係·····	慈波···	81
般若禪思與宋詩翻案——以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 為例·····	陳嘉璟···	97
宋代理學和文學的對立與對話(上)·····	張瑞麟···	131
周邦彥並未「流落十年」考辨(上)·····	薛瑞生···	147
詞的起源論與藝術本體論的密切聯繫 ——王灼《碧雞漫志》詞學理論探究(上)·····	黃雅莉···	177
論宋詞的伎藝化及其娛樂功能·····	王曉驪···	195
《論學繩尺》以「老」評點時文·····	吳建輝···	209
王鞏年譜(三之二)·····	謝佩芬···	227
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目次(1-11)·····		249
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稿約·····		260
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》論文格式·····		261

雕版印刷之繁榮 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—— 兼論印本圖書對學風文教之影響(下)

成功大學中文系 張高評

提 要

印本圖書於閱讀、研究、典藏、流傳方面，較寫本便利多多，因此朝廷對於書坊雕刻圖書，採取三大手段監看控管：或以洩露機密為由，實施看詳禁毀；或藉口搖動衆情，進行監控除毀；或因文集日記牽涉威信、機事、異端、時諱、毀板禁止，蓋有鑑於印本之化身千萬，無遠弗屆，以及深入人心。至於宋代雕版印刷盛況空前，致全國未有一路不刻書，對學風文教之影響，亦可得而言：圖書之刊刻，藏書家或兼理校書刊書，促成校讎學之興盛；雕印之選擇，關係傳播與接受，往往與文風思潮相映發；宋人選刊唐詩宋詩，志在學古通變，自成一家；如此課題，皆有待研討。至於印本圖書之繁榮，引發六大效應：一、印本寫本爭輝，促成知識革命；二、州學書院刊書，提供教養自助；三、運用公帑，藉以刊書營利；四、民間鋟版，或任意刪節，擅自刊行；五、保護版權，則申明約束，禁止翻印；六、印本既多，世不知重，讀書法之倡導遂應運而生。

關鍵詞：雕版印刷 印本文化 知識革命 版權保護 讀書法

四、宋代雕版印刷之盛行及其對學風文教之影響

宋代既大規模開科舉士，蔚為文官政治，貢舉每年取士之多，號稱空前絕後^①。於是形成一個有才、有學、有閒，又不愁生計之文官群體，於公餘之暇，得以投身文化學術活動。朝廷優禮文官，俸祿優厚，《古今合璧事類備要·後集》卷六論俸祿，所謂「國朝之待臣甚厚，養吏甚優，此士大夫自一命以上，皆樂於為用，蓋以有養其身而固其心也」。清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卷二十五，論〈宋制祿之厚〉亦謂：宋廷「待士大夫可謂厚矣！唯其給賜優裕，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，各自勉其治行」。由此觀之，宋代上至朝臣，下至地方官吏，所謂士大夫者，要皆科舉出身，享有優厚之俸祿。士大夫俸祿優厚，經濟寬裕，消費能力強，對於圖書購買，雕版印刷繁榮，自然是一大助力。

宋初開國以來，崇儒右文，提倡讀書。世傳宋真宗〈勸學詩〉所謂：「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；安房不用架高梁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；娶妻莫恨無良媒，書中有女顏如玉；出門莫愁無隨人，書中車馬多如簇。男兒欲遂平生志，六經勤向窗前讀。」旨在強調讀書可以富貴榮華，此即宋代科舉大量拔取人才，布衣可以卿相之形象描述。由於科舉考試無論貢舉或制舉、詞科，多各有其應考科目。士人應舉，欲求勝出，就得「六經勤向窗前讀」，所謂「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，於是上至國子監、太學，下至州縣府學、公使庫、蒙學、私人講學、書院教育，對圖書質量之需求遂變成十分迫切，因此圖書複製技術之革命，勢在必行。傳統之寫本外，雕版印刷之崛起與繁榮，足以因應這種變革。從寫本到印本，在在牽涉圖書購求之便利，知識傳播之快捷，士人方能「博觀而約取，厚積而薄發」。士人需求圖書如此熱切，市場圖書消費量如此龐大，加上士大夫制祿優厚，經濟寬裕，有絕佳之購書能力；雕版印書作為圖書複製技術至宋初已臻成熟，

^① 張希清〈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87年第5期。

於是印本圖書以成本低、利潤高，誘使中央到地方官府刻書，書坊、書院、寺觀、家塾亦紛紛雕印圖書。論者宣稱：南北兩宋三百餘年間刻書之多，地域之廣，規模之大，版印之精，流通之寬，都堪稱前所未有，後世楷模^②。中國圖書傳播由寫本文化嬗變為印本文化，乃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。

(一)雕版印刷之流行與校讎學之勃興

1. 圖書傳播與印本之繁榮

雕版印刷對圖書流通有極大貢獻，當在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）之後；前此，雕版印刷卻仍未普及，宋初以來仍是寫本書和印本書並行。葉夢得（1077-1148）《石林燕語》、張鎰（1153-1211）《仕學規範》，提示了印本書流布，逐漸取代寫本，從而影響古籍整理和學習態度的情形：

唐以前，凡書籍皆寫本，未有摹印之法，人以藏書為貴。人不多有，而藏者精于讎對，故往往皆有善本。學者以傳錄之難，故其誦讀亦精詳。五代時，馮道始奏請官鑄六經板印行。國朝淳化中，復以《史記》、《前》、《後漢》付有司摹印，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，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。學者易于得書，其誦讀亦因減裂，然板本初不是正，不無訛誤。世既一以板本為正，而藏本日亡，其訛謬者遂不可正，甚可惜也。……今天下印書，以杭州為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京師比歲印板，殆不減杭州，但紙不佳；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，取其易成而速售，故不能工。福建本幾遍天下，正以其易成故也。（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）

凡亡闕之書，購求備至；每於藏書之家借本，必令置籍出納。傳寫既畢，隨便給還，靡有損失，故奇書祕籍，悉無隱焉。國學，館閣經史有未印版者，悉令刊刻。（《宋會要輯稿·職官》七之一四）

② 李致忠《古書版本學概論》，第四章第一節〈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〉，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.11），頁50。

忠憲公少年家貧，學書無紙。莊門前有大石，就上學書，至晚洗去。遇烈日及小雨，即張敝傘以自蔽，時世間印板書絕少，多是手寫文字，每借人書，多得脫落舊書，必即錄甚詳，以備檢閱，蓋難再假故也。仍必如法縫粘，方繼得一觀，其艱苦如此。今子弟飽食放逸，印書足備，尚不能觀，良可愧恥。（張鎰《仕學規範》卷二，引《韓莊敏公遺事》）

大約在宋仁宗皇祐年間（1049－1054），圖書流通仍以寫本為主，張鎰《仕學規範》所謂「時（仁宗嘉祐年間）世間印版書絕少，多是手寫文字」者是也。即以北宋官私藏書言之，亦多手鈔寫本^③；洪邁（1123－1202）感慨北宋圖書至南宋，「無傳者十之七八」，也是受限於寫本不能「化身千萬」，廣為流傳之故。蘇軾（1036－1101）曾手書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晁說之（1059－1129）曾傳寫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，可以為證。尤其朝廷中央秘閣三館藏書，善本多為寫本；即私人藏書家，亦往往手抄傳寫珍本秘笈，作為度藏之特色。印本之普及，大抵在南北宋之交。由於宋太宗淳化（990－994）以來對印本之推廣；宋真宗購求亡闕，刊刻經史；至南北宋之際，葉夢得撰《石林燕語》時，已是「書籍刊鏤者益多」，有所謂杭本、蜀本、建本之目，而「福建本幾遍天下」。雕板印刷之流行，由此可見。

自北宋太宗、真宗以來，有心推廣雕版圖書，或「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」，或「只收官紙、工墨本價，許民間請買」，故真宗紹令「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」，「此固非為利，正欲文籍流布耳」，國子監印本既有平準書價之功能，最有利於圖書之推廣與流通，直接影響坊刻與家刻之書價。靖康之難（1127），國子監所貯書版，盡為金人劫掠毀棄。南宋高宗紹興九年（1139），下詔重新校刻經史群書；二十一年，「監中闕書，次第鏤版」，

③ 曹之《中國古籍版本學》，第二編第一章，三、〈宋元寫本〉，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2.5），頁111－119。

論者以為：朝廷此舉，「說明雕版書已成為國家藏書主體」^④：

監本書籍者，紹興末年所刊也。國家艱難以來，固未暇及。九年九月，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，始請下諸道州學，取舊監本書籍，鏤版頒行。從之。然所取諸書多殘缺，故胄監刊《六經》無《禮記》，正史無《漢》、《唐》。二十一年五月，輔臣復以為言，上謂秦益公曰：「監中其它闕書，亦令次第鏤板，雖重有所費，蓋不惜也。」繇是經籍復全。先是，王瞻叔為學官，嘗請摹印諸經義疏及經典釋文，許郡縣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，置之於學。上許之。今士大夫仕於朝者，率費紙墨錢千餘緡，而得書於監云。（李心傳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甲集卷四，〈監本書籍〉）

宋室南渡後，秘閣藏書缺佚甚多，紹興五年（1135），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：「四庫書籍多闕，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版，不論經、史、子、集、小說，各印三帙，赴本省。係民間，官給紙墨工賃之值」，從之。其後，詔從張彥實之請，「取舊監本書籍，鏤版頒行」；又其後，高宗詔令「監中闕書，次第鏤板」，甚至不惜「重有所費」，如此慘澹經營，盡心致力，「繇是經籍復全」，這真是監本書籍刊刻典藏之大事。論者稱：國子監印本發行量極為龐大，但「所鬻書，其值甚輕」。進入國子監讀書之士人，不論出身貴賤，繫籍與否，目的皆為參加科舉考試。國子監生與鄉貢進士，皆是監本最主要之購買者。「及科場罷日，則生徒散歸」（《文獻通考》卷四十二，〈學校考三·太學〉），無論榜上有名或名落孫山，成千上萬之監本圖書，將隨士子之返回故鄉而傳播天下各地^⑤。

④ 李瑞良《中國出版編年史》上卷，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4.5），頁306。兩宋監本182種，「北宋監本刊于杭者，殆居泰半」，說見王國維《兩浙古刊本考·序》。高宗南渡，移都臨安（杭州），於是官刻、坊刻、家刻繁盛，書肆、書攤林立，且印本品類多元，應有盡有。其他，蜀刻、建本亦多。

⑤ 何忠禮〈科舉制度與宋代文化〉，二、（二）書籍的大量流布，《歷史研究》1990年5期；袁小盾策劃《歷代教育制度考》上卷，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4.7），頁1033。

官刻除監本外，尚有公使庫本、州縣學刻本；民間出版品，則大致分為坊刻本、家刻本，以及書院刻本。南宋刻書業尤其繁榮，家刻本多精品，書院刻書尤其別具特色。

2. 印本繁榮與校讎學之勃興

宋代校讎學之興起，與國家級圖書館藏書先經覆勘校理，再轉交國子監雕版印行有關。而且，朝廷右文崇儒，注重古籍整理，故校勘圖書蔚為風氣。尤其寫本、鈔本開雕成印本圖書後，圖書勢將「一以板本為正」，為避免版本訛舛、脫略、闕疑、亡失，無論秘閣校理善本、學者整理文獻，或私家藏書刊書，都追求完備精善，校讎學遂因雕版印刷之繁榮，而雲蒸霞蔚。分論如下：

宋初承五代喪亂，下詔獻書，館閣抄存，必經校勘。大中祥符八年四月，因王宮火災，三館秘閣圖籍多成灰燼，真宗詔以太清樓副本重新寫錄，選官詳覆校勘。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徽宗詔：「三館閣之富，而歷歲滋久，簡編脫落，字畫訛舛，較其卷帙，尚多逸遺，甚非所以崇儒右文之意。」於是設置「補完校正御前文籍局」。由於古籍整理，手抄傳錄珍籍善本，故南北宋國家級之圖書館設有圖書整理機構，寫本、傳抄本、藏本交付國子監雕版印刷前，先經詳覆校勘、增修校正、補寫校理、補完校對、書寫校勘，如宋徽宗之詔示，對舛舛訛謬者，加以刪改校正；大段損缺者，重別雕造：

淳化五年（994）兼判國子監。至上言：「《五經》書疏已板行，惟《二傳》、《二禮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七經疏未備，豈副仁君垂訓之意？今直講崔頤正、孫奭、崔偓佺等皆勵精強學，博通經義，望令重加讎校，以備刊刻。」從之。後又引吳淑、舒雅、杜鎬檢正謬誤，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。（《宋史》卷二百六十六，〈李至傳〉）

（大觀二年，1108）八月二十七日上批：國子監印造監本書籍，舛舛頗多，兼版缺之處，筆吏書填不成文理。頒行州縣，錫賜外夷，訛謬何以垂示？仰大司成專一管勾，分委國子監、太學、辟雍官屬正、錄、博士、書庫官，分定工程，責以歲月，刪改校正，疾速別

補。內大段損缺者，重別雕造，仍于每集版末注入今來校勘官職位、姓名。候一切了畢，印造一監，令尚書禮部覆行抽搞，總檢有無舛舛，保明聞奏。今後新行書籍，仰強淵明，不得奏乞差官置局。今貽改《毛詩》一冊降出。（《宋會要輯稿·職官》二八之一八）

《七經疏》於國子監鏤版刊行前，李至奏言：先令博通經義之士，「重加讎校」；其次「檢正謬謬」，終則李至與李沆「總領而裁處之」，然後方能「以備刊刻」。其間過程，即「是正版本」之校讎課題。據《宋會要輯稿·崇儒》等文獻，國子監監本開雕前，必先覆勘校理：因此，八年，設置都大提舉校勘館閣書籍所；嘉祐二年，設置校正醫書局；嘉祐四年，設置三館秘閣編校所；元祐二年，設置校對黃本書籍所；宣和元年，設補完御前書籍所；四年，置補完校正御前文籍所；紹興十四年，設置補寫所^⑥。由此可見，無論三館秘閣庋藏之寫本抄本，必經覆勘校理；即交付國子監雕版印行，補完校對等古籍整理程序，亦不能鹵莽闕略。朝廷藏書與印書，覆勘校理之程序如此繁瑣慎重，功夫如此精密講究，自然影響士人之古籍整理，書坊之刊刻圖書，以及私人藏人家校書、印書、藏書之三位一體。

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，稱北宋雕印圖書，蜀本建本「幾遍天下」，蓋「多以柔木為之，取其易成而速售」。「易成而速售」，既是圖書商品化之必然趨勢，如何兼顧「版本是正」，避免謬奪闕劣？此乃校讎學之課題。宋代雕版印刷繁榮，直接促進校讎學之發展，宋代文獻有言：

議者以為，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，雖有舛誤，然尚可參讎。至五代，官始用墨版摹《六經》，誠欲一其文字，使學者不惑。至太宗朝，又摹印司馬遷、班固、范曄諸史，與《六經》皆傳，于是世之寫本悉不用。然墨版訛駁，初不是正，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。（程俱《麟臺故事》卷二之一一）

⑥ 郭聲波《宋朝官方文化機構》，第四章〈宋朝官方圖書機構〉，第三節「圖書整理機構」，（成都：天地出版社，2000.6），頁101-105。

由於雕版圖書印量極大，影響自然深遠，因此，刊行出版前之覆刊校理十分重要。尤其刊本既行，寫本日亡，如果「墨版訛駁，初不是正」，影響所及，將使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」，校讎學隨雕版印刷發達而應運產生，自然是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。監本之刊行，三館秘閣置所設局覆勘校理圖書，良有以也。官方雕印圖書，設有專職專人校讎文字，故監本精良，足為典範；至於唯利是圖之坊刻本，則不必然。岳珂（1183－1234）《愧郗錄》卷九亦稱：「建陽書肆日輯月刊，時異而歲不同，以冀速售」，因為「學者易于得書」，所以「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」。這不僅牽連到藏書之意願，更影響到讀書態度：「誦讀亦因滅裂」，同時左右了古籍整理：「一以板本為正，而藏本（即寫本、鈔本）日亡」所衍生之問題，於是促成南宋後版本校勘學之勃興，開啟後世藏書家兼理校書、刻書之風氣。

書籍校勘之學，漢代以後，唯宋人為最勤、範圍亦最廣。就程俱（1078－1144）《麟臺故事》記載，自太宗淳化五年（994）至仁宗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三館秘閣置所設局，校勘之書籍有：《史記》、《前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晉書》、《唐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南華真經》、《莊子注》、《列子沖虛真經》、《文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書》、《文苑英華》等等，尤其對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，多進行反覆之校勘。王應麟《玉海》著錄宋代校刊群書，如開寶校經籍釋文，端拱校《五經正義》，淳化校《三史》，嘉祐校《七史》，咸平校定《七經義疏》、三館書籍，景德刊正《四經》、校諸子，康定校《群經音辨》，至和與嘉祐刊刻石經，熙寧是正文字，紹興校御府書籍等等，可見朝廷為是正版本，所作持續性之校讎工作。朝廷倡導於上，故天下隨之。至於私人校書之風亦盛行，成就亦頗有可觀。如劉敞《東漢刊誤》四卷、吳縝《新唐書糾謬》二十卷、《新五代纂誤》五卷，廖瑩中《九經總例》、彭叔夏《文苑英華辨證》十卷、方崧卿《韓集舉正》十卷、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異》十卷、張淳《儀禮識誤》三卷等，要皆校讎學之經典著作。校勘書籍所以特別發達，當與雕版印刷之繁榮，密切相

關^⑦。

印本圖書果真校勘精善，版本美好，則確實有「一其文字，使學者不惑」之知識傳播貢獻。迨雕版印刷流行昌盛，促使寫本不用而日亡。若印本「初不是正」，寫本又淪亡，將引發「更無它本可以刊驗」之危機。因此，宋代藏書家多精於校書，否則，寧可不藏書：

承平時，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、歷陽沈氏……俱有藏書之名，今皆散佚。近年來所至郡府，多刊文籍，且易得本傳錄。仕宦稍顯者，家必有書數千卷，然多失于校讎也。吳明可帥會稽，百廢俱舉，獨不傳書。明清嘗啓其故，云：「此事當官極易辦，但僕既簿書期會，賓客應接，無暇自校；子弟又方令為程文，不欲以此散其功；委以他人，孰肯盡心？漫盈箱篋，以誤後人，不若已也。」（王明清《揮塵前錄》卷一）

藏書所以多散佚，蓋緣圖書多為寫本。雕版圖書化身千萬，較有機會保全傳世。唯印本崛起，取代寫本，若「失于校讎」，勢將貽誤後學。宋代藏書家所藏書「多手自繕錄」，且精心校讎，其抄本之精良，誠可「一其文字，使學者不惑」，故藏書家之傳抄本多稱善本，職是之故。

(二)商品經濟促成印本激增，影響學風時尚

雕版印刷，是複製圖書既快又多之文化產業，對於傳播知識，記錄心得，宣揚思想，圖書流通，文化推廣，迅速而便捷。在右文政策、科舉取士政策下，士大夫俸祿優厚，有錢有閒，積極從事文化學術活動，遂直接促成雕版圖書成為消費商品，蔚為商品經濟文化產業之繁榮。雕版圖書成為商品經濟之一環，首先考慮低成本，其次為高利潤，其中牽涉到市場競爭、產品

⑦ 張君和《張舜徽學術論著選》，〈論宋代學者治學的廣闊規模及替後世學術界所開闢的新途徑〉，丙、校勘群書的工作，（武昌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7.12），頁197—200；曾貽芬、崔文印《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》，〈宋代對歷史文獻的校勘〉，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0.4），頁274—301。

價格、流行風潮，以及消費心理等等。趙宋承五代戰亂兵火之後，人民修養生息之餘，經濟進步，工商發達，形成所謂商品經濟之繁榮。王安石變法，制定均輸法、免役錢、鹽鈔法，皆與工商業有關；政府又為之制定市易法、常平倉法等，以防市場之壟斷。至北宋末年，商業稅收幾佔全國歲入七分之一，可見經濟之雄厚實力。學界論述北宋商品經濟之繁榮與發展不少，可以參看^⑧，唯專論圖書出版與商品經濟之論著不多。筆者嘗試論述圖書商品化之後，對宋代學風時尚之影響：

1. 以竹紙板片雕版印刷，成本低廉

試考察雕版印刷之崛起與發達，除朝廷右文政策之實踐外，廣大消費市場對印本圖書之強烈需求，為一大誘因。無論著者、讀者，抄書者、書商、藏書家，乃至於宗教祈福，學術交流、民生日用，在在需求殷切。在造紙技術成熟、製墨技術精良之客觀條件下，業者往往選擇樹材竹林遍布，不虞匱乏之東南或西北丘陵地區，成為刻書中心，如江浙之湖州、蘇州、杭州、衢州、婺州，四川之成都、平江、眉山，福建之麻沙、崇化、建陽、福州、建寧，以及江淮湖廣，多先後成立刻書中心，從事監本、書坊本、家刻本之雕印。蓋中國古代造紙原料，從大麻、黃麻、亞麻、苧麻，到藤、穀、楮、桑；唐中葉以降，逐漸以竹子為造紙之主要原料。《東坡志林》卷九稱：「今人以竹為紙，亦古所無有也」；周密《癸辛雜識》卷一亦云：「淳熙末始用竹紙」，可見遲至十一、十二世紀之宋代，竹紙始盛行用於雕印圖書。竹，廣泛生長於長江流域，與南方之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之丘陵地帶。竹材纖維修長，生長快速，且數量眾多，取得容易，印刷紙材成本低廉^⑨。

除印刷用紙外，雕版所採用之木料，大抵選擇落葉木材製作板片，取其

⑧ 何應忠〈北宋商品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問題〉，《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》，（石家莊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1991.5），頁121-132；孫克勤〈宋代商品經濟論析〉，《雲南民族學院學報》1993年1月；張熙惟〈宋代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及其歷史地位〉，《文史哲》1996年6月；姜錫東〈宋代商人的市場壟斷與政府的反壟斷〉，漆俠主編《宋史研究論叢》第三輯，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1999.4），頁146-166。

⑨ 錢存訓《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》，〈造紙與製墨〉，「中國古代的造紙原料」，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2.12），頁76-82。

紋理細密，質地均勻，易於雕刻；刻書業者為顧及貨源，往往就地取材，不但資源豐富，而且價格低廉。如梨木、棗木、黃楊木、銀杏木、梓木、皂莢木等等，或硬度適中，紋理細緻；或木質堅硬適合精細雕刻，故印刷術語，有所謂災梨、鉅棗、付梓，職是之故。生長於北方，或高緯度之針葉林木，木料雖質地柔軟，紋理直順，然樹幹多疤節，難以鑄刻；而且樹脂含量過多，容易翹曲，經不起三刷五刷，筆道紋路即模糊變形，故不適合選作雕版用材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八稱雕版印書，「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為之，取易成而速售，故不能工。福建本幾遍天下，正以其易成故也。」^⑩上述梨木、棗木、黃楊、梓木、皂莢、銀杏等雕版用材，江浙、福建、四川、江、淮、湖、廣山丘多盛產之，所謂「茂林修竹，所在皆有」，就地取材，資源豐富，相形之下，雕版成本低廉，利潤即較豐厚。

書籍之雕版印刷，依據前所引沈虞卿黃州郡齋刊本《小畜集》序、象山縣學刻本《漢雋》題記、舒州公使庫本《大易粹言》課文，雕版之成本費指印書紙費、刻版費、工墨裝背錢；每部印本圖書售價扣除成本費，始稱盈餘。據此言之，每售出一部《小畜集》，即有233%之高利潤；一部《漢雋》印本圖書，利潤亦高達70%。每賣一部《大易粹言》，公使庫即有五貫三百文之利潤；而當時民眾每月生活費約在三貫至六貫之間。按諸民生消費指數而言，雕版印刷利潤之優渥，促使中央到地方、私宅、家塾到書坊、書肆、書院、寺院而道觀、祠堂，紛紛刻書鏤版。論者稱：「南北兩宋三百餘年間，刻書之多，地域之廣，規模之大，版印之精，流通之寬，都堪稱前所未有，後世楷模」^⑪；成本低，利潤高，圖書生產蔚為商品經濟，為主要誘因。

2. 圖書雕印之選擇與文風思潮相映發

雕版印刷之圖書選擇，大抵與兩宋之文風思潮相呼應，此亦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必然效驗。《易》為憂患之學，《春秋》為經世之書，故兩宋經學

⑩ 錢存訓《中國紙及印刷文化史》，第六章〈(一)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序〉，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.5），頁176-177。

⑪ 李致忠《古書版本學概論》，第四章第一節〈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〉，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.11），頁44-50。

之刊行，唯《易》與《春秋》為顯學。

陳寅恪稱：「中國史學莫盛於宋」，表現在國史之記述，舊史之整理，大部編年史《資治通鑑》、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之完成等等，或重直書實錄，或重經世資鑑，大多雕版成書，刊印流傳。就宗教思想而言，佛教藏經在宋代雕版印刷，存留九種版本；道藏亦鏤版刊行，宋人之崇佛、禪悅、好道，印本圖書之出版，自有迴響。試觀宋代詩學講究通變、言意；詩話筆記標榜《春秋》書法，史家筆法，於是詩歌創作亦往往以《春秋》書法入詩，以史家筆法入詩。佛教，尤其禪宗之影響宋代詩話，蔚為以禪喻詩、以禪論詩，創作則以禪語入詩、以禪思為詩思，及以禪學入詩諸現象。道家道教影響宋代詩學與詩歌，如自然、平淡、樸拙、清空、超脫等之體現，奪胎換骨、點鐵成金之借用與轉化，皆是經學、史學、佛道思想影響於詩學詩歌，信而有徵者。

宋人詩集、文集之刊行，宋代詩話筆記之雕印，以及宋人為學唐變唐，而整理唐人別集；為學古通變，妙悟自得，亦編選唐人詩、選刊宋人詩，其中自有宋人典範之追尋，自成一家之期待在也。吾人皆知宋型文化不同於唐型文化，筆者以為：其中重大關鍵在印本文化之影響，促成圖書流通之便捷，知識傳播之快速，蔚然引發許多「異場域之碰撞」¹²，不同文類、殊異學科間之會通整合，形成創意開發之無限。因雕版印刷流行，知識傳播快速而多元，促成許多「會通交融」之機會，對於宋詩面對唐詩之盛極難繼，處窮必變，印本之流通傳播，提供了許多開發之生機。論述如下：

學界研究確認，唐人詩文集，傳流後世者，多經宋人整理刊行。筆者更發現：宋人整理雕印前代詩文集，是講究選擇的，一言以蔽之，多與宋人追求詩歌典範的歷程合拍。如宋詩歷經學白、學晚唐、學韓、學杜、學陶之過

¹² 所謂「異場域碰撞」，指不同領域的交會，是一種跨學科之思考技術；異場域之碰撞所爆發的驚人創新，稱為梅迪奇效應（The media effect）。梅迪奇是中古歐洲義大利佛羅倫斯一位銀行家，曾經資助科學家、詩人、畫家、哲學家、雕刻家經費，促成和金融家、建築師濟濟一堂，彼此交會、切磋、觸發、激盪，於是打破彼此範疇和文化藩籬，其中之創新觀念，促成了文藝復興。參考 Frans Johnsson 著，劉真如譯《梅迪奇效應》，（臺北：商周出版，2005.10）。

程，於是《白氏文集》、李商隱、李賀、賈島詩集，先後雕印之版本較多；尤其宋代有千家注杜，著錄之宋版杜集尚有129種；五百家注韓，宋元韓集尚有102種；《陶淵明集》兩宋版本大約在16種以上。《滄浪詩話·詩體》所列白體、晚唐體、昌黎體，宋人之版本目錄多有體現；清沈曾植稱：「宋詩導源於韓」；徐復觀謂：「北宋詩人都有白詩的底子」；陶淵明詩、杜工部詩為蘇黃及江西詩派所宗法追慕，奉為典範學習。自北宋元祐後至南宋，江西詩風席卷天下，舉世宗杜學陶。就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推之，流行風潮即是市場導向，雕版印刷與文學風尚，固相互為用，相得益彰也。

3. 宋人選刊唐詩宋詩，志在學唐變唐，自成一家

就宋人選唐詩而言，其中自有學習唐詩優長，追尋詩學典範，建構宋詩宗風，鼓吹詩派風尚之意義在。如李昉等奉勅編撰《文苑英華》一千卷，見宋人之師在學唐；王安石編選《四家詩選》、《唐百家詩選》，見宋詩之宗杜；洪邁編選《萬首唐人絕句》體現江湖之詩風；周弼《三體唐詩》，見宋人之宗法三唐；孫紹遠《聲畫集》，見宋人「詩畫相資」之出位會通；劉克莊《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》，見南宋「唐宋兼采」之詩風旗向；其他，如趙孟奎《分門纂類唐歌詩》，元好問《唐詩鼓吹》，要皆標榜唐詩，宗法中晚唐，所謂「學唐變唐，而出其所自得」，上述唐詩總集之編選刊刻，可作如是觀。宋人以學唐為手段，為變唐為過程，以自成一家為目標，編選刊印唐人別集總集，自有市場價值。詩歌總集之版本刊印，可詳祝尚書《宋人總集敘錄》。

再就宋人選宋詩而言，亦可見宋詩體派之流衍。考《四庫全書》集部總集類，宋人編選刊刻之詩選總集，有《西崑酬唱集》、《三蘇先生文粹》、《坡門酬唱集》、《江西宗派詩集》、《四靈詩選》、《江湖集》前集、後集、續集、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、《瀛奎律髓》，從可見西崑體、東坡體、江西詩派、四靈詩派、江湖詩派，以及江西詩派標榜「一祖三宗」之詩學取向。祝尚書《宋人總集敘錄》，於此頗有著錄。乃至於宋詩別集之編纂刊行，從可見宋詩大家名家之風起雲湧，「江山代有才人出」；如王禹偁之《小畜集》、《小畜外集》，蘇舜欽之《蘇子美集》，梅堯臣《宛陵先生文集》、歐陽脩《歐陽文忠公集》、邵雍《伊川擊壤集》、王安石《臨川先生